

# 从“村民”到“居”民的身份缝补： 以兰州 Y 社区为例

何宇翼

西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村作为城乡交错的“转型缝隙”，其居民的身份认同呈现出复杂的破碎与重构特征。本研究以兰州市 Y 社区为例，基于建构主义视角，探讨多元群体在制度与文化夹缝中的“身份缝补”策略。质性研究发现，身份认同为情境化的动态建构：原村民采取基于“瓦片资本”的区隔性融入；返迁老人呈现空间摇摆下的回归性建构；外来租户则趋于功能性的边缘化停泊。此建构过程彰显了个体在结构约束与能动性间的动态平衡。

**关键词：**城中村；身份缝补；身份认同；Y 社区；质性研究

DOI: 10.64649/yh.shygl.issn3105-0085.202603018

## 0 引言

伴随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城中村作为城乡交错的“缝隙地带”，承载着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现实需求。在此场域内，传统的乡土血缘网络与现代城市治理制度发生激烈碰撞，导致居民在“村民”与“市民”之间陷入身份模糊与转型困境。因此，身份的协商与重构成为洞察城中村社会变迁的关键视角。

Y 社区作为典型的城中村飞地，内部呈现出原村民、外来务工人员与返迁群体杂处的异质性社会结构，为本研究提供了现实样本。基于此，本研究聚焦 Y 社区，旨在探讨：在这一特定场域中，不同身份的行动者如何在“村民”与“居民”的边界上进行互动与协商？面对制度与文化的交汇冲击，他们分别采取了何种“缝补”策略以实现社会融入？其认同建构背后的微观社会学路径又是如何动态展开的？

## 1 文献综述

### 1.1 不同身份居民的社会互动与制度适应

不同身份居民在城中村社区中的社会互动与制度适应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征。贾亚娟等（2024）指出，居民的主观认知与生活期望显著影响其参与社区环境整治的意愿，体现出积极的制度适应态度<sup>[1]</sup>。张理政与叶裕民（2024）通过“阶梯效应”和“藩篱效应”揭示了身份居民在社会融合中的结构性障碍与机遇<sup>[2]</sup>。付楚珂（2023）强调，更新模式需兼顾原住民与新居民利益，促进多元身份和谐共存<sup>[3]</sup>。蔡银莺等（2021）发现政策实施中不同身份居民对补偿安排反应差异，反映制度适应的复杂性<sup>[4]</sup>。魏爱棠（2020）指出，强关系网络是原村民维系归属感和身份认同的关键<sup>[5]</sup>。叶裕民等（2020）强调制度创新对促进社会融合的重要性<sup>[6]</sup>。刘

强等（2019）认为身份认同与制度适应是动态调整过程<sup>[7]</sup>。战洋与童小溪（2017）分析了文化与制度双重因素对社会互动的影 响<sup>[8]</sup>。刘于琪等（2017）揭示不同身份居民通过邻里交往构建认同并响应制度环境<sup>[9]</sup>。社会互动与制度适应相辅相成，是城中村多元身份融合的关键。

### 1.2 传统与现代、村民与居民身份边界的协商与重构

城中村居民在身份认同的建构中，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以及村民与居民身份边界的协商尤为关键。陈志等（2016）指出，居民在市民化进程中需平衡乡土情感与城市规范，推动身份动态调整<sup>[10]</sup>。周晨虹（2015）强调，城市融入不仅是经济适应，更是文化与社会关系的重塑，传统血缘地缘关系被重新定义<sup>[11]</sup>。王海龙（2014）主张包容性改造应尊重文化认同，实现传统与现代融合<sup>[12]</sup>。陈晓莉（2014）反思制度设计忽视文化归属，导致认同矛盾<sup>[13]</sup>。

## 2 研究方法

### 2.1 方法与样本说明

本研究立足于建构主义范式，强调现实是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中通过社会互动不断生成的产物，身份认同不可避免地带有极强的流动性与情境依赖性。为了尽可能展现 Y 社区在“半城市化”转型期内部错综复杂的异质性结构，本研究在田野调查阶段综合运用了目的性抽样与滚雪球抽样，最终以四位处于不同社会结构位置的被访者为例进行深度访谈。

这四位受访者在社区场域中构成了具有高度代表性的“差异化矩阵”。其中，47 岁的 W 女士与 69 岁的 L 女士作为原村民的典型代表，分别映射了转型期社区内不同代际的应对逻辑：前者凭借房屋确权后的“瓦片资本”谋求经济

层面的务实适应，而后者则在急剧的空间重构中，展现出高龄群体对乡土记忆与传统习俗的顽强坚守。相较于原住民的“留守”，M先生作为在城市商品房与城中村老屋之间频繁往返的行动者，他的空间轨迹深刻折射出老年群体在逃离现代性规训后，对本体性安全的重新寻找与心理复位。此外，本研究还将目光投向了处于社区治理与福利分配边缘的流动人口。以外地骑手C先生为代表的异乡务工者，生动勾勒出外来群体依托城中村廉价空间维持生计的底层图景，凸显了他们在非正式制度缝隙中“液态生存”的功能性妥协。

## 2.2 伦理与反思

为恪守研究伦理并保护受访者隐私，本研究严格对社区名称、受访者姓名及住址等所有可识别信息进行匿名化处理，防范信息泄露风险。数据采集前，研究者均明确告知录音目的与范围，充分尊重受访者意愿，遇拒录者则以手写笔记替代。所有数据处理流程均遵循严格的保密协议，承诺相关资料仅作学术研究之用。

## 3 认同路径探究

### 3.1 原村民：基于“瓦片资本”与传统边界的区隔性融入

对于拥有土地和房屋产权的原村民而言，他们的认同建构是在追求城市化经济红利与坚守传统村落边界之间展开的。这种融入呈现出高度的策略性与区隔性。

(1) 空间资源的资本化转化。在村改居的宏观制度变迁下，原村民并未被动接受身份的转换，而是将“村民”身份所附带的非正式产权转化为城市生存的“瓦片资本”。房屋不再仅仅是居住空间，更是劳动再生产与抵御市场风险的核心工具。正如47岁的W女士所言：“老房子空了两间，也住不上，就租给两个在附近工地干活的小伙子……除非赔我三套新房，还得在一楼留个店面。我这还有儿子养，我没文化，生活费都是靠租出去和这个面店……”W女士的表述生动展现了原住民务实的生存逻辑：对社区改造的抵触或接受，核心在于资源置换的筹码是否充足。他们在“房东”这一微观权力角色中，实现了经济层面的浅度城市融入。

(2) 仪式抵抗与文化边界的固守。面对现代城市管理制度的规训，原村民通过坚守传统仪式进行隐性抵抗。69岁的L女士在访谈中激动地表示：“七月十五烧包袱！去年社区说要环保不让烧纸，老祖宗一直以来的规矩，怎么可能，最后干部妥协了该烧的还是烧。拆了就是掘祖宗的根！”在此情境中，“烧包袱”不

仅是对先人的祭奠，更是原村民用以确认“我是谁”以及划定“我们（原住群体）”与“他们（外来治理者）”边界的文化防御机制。通过仪式的展演，老一辈村民在现代社区的夹缝中缝补了自身的本体性安全。

### 3.2 返迁老人：空间摇摆与本体安全的回归性建构

返迁老人是城中村内一类特殊的“逆城市化”群体。他们的认同路径呈现出在现代商品房与传统城中村之间往返摇摆，并最终寻求乡土复位的特征。

(1) 逃离现代规训与物理空间的复位。城市商品房代表着现代文明的整洁与秩序，但对传统村民而言，这种秩序构成了对身体自由与家庭权威的压抑。原村民M先生回忆道：“住城里，我儿媳买那些盘盘碗碗的，吐渣吐碗里，我儿子也说让给孙子做个榜样，我就记着。我回自己的窝，想吐哪我吐哪。”M先生以“照顾孙子”为显性理由重返Y社区老屋，其隐性的心理动机实则为了逃离现代性规训，在熟悉的物理空间中找回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与主体地位。

(2) 记忆传承作为身份确证的媒介。身份认同需要在社会互动中被不断确证。M先生在社区中通过向孙辈传授乡土知识和诉说村庄历史来建构认同，他提到：“接他放学路上我就教认野菜：‘这是荠菜，你爸小时候饿急了连猪草都啃！’现在这些娃娃连土生土长得都不认识。”这种互动实际上是在进行权力的微观建构，借由记忆的传递，在年轻一代面前确立了自己作为“历史见证者”和“文化权威”的合法身份，从而在剧烈变迁的社区空间中稳固了自己的社会坐标。

### 3.3 外来租户：功能性妥协与液态生存的边缘化停泊

以外卖员、农民工为代表的流动群体，由于缺乏产权与制度保障，其在Y社区的认同路径表现出典型的“液化”与边缘性。

(1) 极端务实的“液态生存”逻辑。对于流动群体而言，Y社区并非承载情感与归属的“家园”，而是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廉价“补给站”，其认同建立在极具理性的成本核算之上。外卖骑手C先生直言：“离我送外卖的商圈近，一室一厅月租650块，房东还不管我半夜下班动静大……建公寓我肯定就租不起了啊！哪有这个一个月650香，环境算不上好，但有个干净的地睡。”面对社区物理环境的脏乱差，他表现出极强的忍耐力与妥协性。这种生存策略印证了齐格蒙特·鲍曼的“液态现代性”特征——流动人口拒绝在一个地方扎下深根，以保持随

时迁徙的弹性。

(2) 底层抱团与微观政治的运用。由于被排斥在正式的社区治理网络之外,外来租户必须通过非正式途径缝补生存缝隙。C先生在讲述日常交往时提到:“去年过年我给房东送了一箱苹果,他准我在院子里放电动车充电,别的租户可没这待遇!隔壁那个也是送外卖的,有次我电动车没电借他电池,后来久而久之就熟了……”一方面,他们熟练运用“小礼物政治”与掌握空间权力的原村民进行利益交换;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弱关系”进行底层互助以抵御日常风险。这种让渡部分尊严以换取生存便利的互动,凸显了他们在社区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地位与功能性妥协。

#### 4 结论与建议

##### 参考文献:

- [1] 贾亚娟,陈嘉鹏,兰雅丽.主观认知与生活期望对城中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意愿的影响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4,38(08):62-70.DOI:10.13448/j.cnki.jalre.2024.163.
- [2] 张理政,叶裕民.论城中村对市民化的双重作用机制——“阶梯效应”和“藩篱效应”[J].城市规划,2024,48(11):98-109.
- [3] 付楚珂.基于社会融合的中小城市城中村更新模式探索——以湖南郴州典型城中村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23,30(11):83-90.
- [4] 蔡银莺,张小琿,杨青.城中村更新住房补偿基底选取及村民政策满意度研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5):138-146+198.DOI:10.13300/j.cnki.hnwkxb.2021.05.015.
- [5] 魏爱棠.村庄边界与在地伙伴网络的建构——以城中村社区营造过程为例[J].中国社会工作研究,2020,(01):120-147+218.
- [6] 叶裕民,张理政,孙玥,等.破解城中村更新和新市民住房“孪生难题”的联动机制研究——以广州市为例[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34(02):14-28.
- [7] 刘强,王勇,周凯琦.逆转与嬗变:城中村认知与改造研究演进[J].现代城市研究,2019,(08):41-48.
- [8] 战洋,童小溪.“城中村”与中国城市化的特殊道路[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2(06):183-189+197.DOI:10.13613/j.cnki.qhdz.002699.
- [9] 刘于琪,刘晔,李志刚.居民归属感、邻里交往和社区参与的机制分析\*——以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为例[J].城市规划,2017,41(09):38-47.
- [10] 陈志,丁士军,吴海涛.当农民还是做市民:城中村居民市民化意愿研究[J].财政研究,2016,(11):80-90+102.DOI:10.19477/j.cnki.11-1077/f.2016.11.007.
- [11] 周晨虹.城中村居民的“城市融入”:基于社区社会资本的类型分析[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5,14(05):531-537.DOI:10.16195/j.cnki.cn36-1328/f.2015.05.012.
- [12] 王海龙.建构新型城市化时期包容性城中村改造模式[J].北京社会科学,2014,(03):75-85.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140310.
- [13] 陈晓莉.村改居社区及其问题:对城中村城市化进程的反思与改革[J].兰州学刊,2014,(03):126-132.

**作者简介:**何宇翼(2005.06—),女,土家族,本科,研究方向:社会研究方法、农村社会学、组织社会学、青年社会学、婚姻家庭。

在此次研究中,发现城中村居民的身份认同并非固定的属性标签,而是受制度、文化与社会网络多维交织影响的动态情境化建构过程。在应对城市化变迁时,不同群体展现出高度差异化的社会融入策略:原村民依托深厚的血缘与地缘强关系,通过维系传统习俗巩固主体认同;返迁老人借助代际互助网络,在乡土传承与现代生活之间寻求身份的动态平衡;外来租户则受制于制度壁垒与文化隔阂,多采取基于弱关系和经济妥协的实用主义生存策略,其融入呈现被动性与脆弱性。这种多元且充满张力的认同建构,深刻折射出城中村复杂的底层社会结构。由此,社区治理应精准回应不同群体的具体需求与融入路径,以推动城中村迈向多元共生的和谐发展。